

中国读本



青燈映綠紗
烏井開乳
手風露透已寒
動處故故始
一試寄言
當念麻字單

中国经济史话

戴扬本 著

二十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被发掘出来。这些深藏在地下的远古文化遗物一旦重见天日，便以无声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人类的经济活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经济史话

戴扬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史话 / 戴扬本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4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90-0

I. ①中… II. ①戴… III. ①经济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7224号

中国经济史话

著者	戴扬本
责任编辑	刘川民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70千字
印 张	9.7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0年4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4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90-0/F · 326
定 价	16.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揭开远古时代经济的神秘雾纱

- 一 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的故事
- 二 星罗棋布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三 大同与小康

第二章 青铜时代

- 一 若明若暗的夏代经济
- 二 上古经济的鼎盛时代——商
- 三 由盛至衰的西周经济

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

- 一 铁犁与钢剑
- 二 商业与城市的繁荣
-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四章 秦汉一统

- 一 繁盛而短暂的秦朝经济
- 二 从清静无为到有为的失败
- 三 东汉经济的恢复

第五章 混沌与秩序

- 一 鼎足而立的三国经济
- 二 十六国北朝的经济
- 三 江南经济的开发

第六章 再现雄风

- 一 昙花一现的隋朝繁荣
-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 三 盛极而衰的唐后期经济

第七章 神奇的无形之手

- 一 精细耕作农业体系的形成
- 二 巧夺天工的手工业
- 三 煌煌灯火话夜市
- 四 民族经济的融合与发展

第八章 鸡鸣晓看天

- 一 鱼鳞图册与明初经济的恢复
- 二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 三 盛世与危机
- 四 走出中世纪

第一章 揭开远古时代经济的神秘雾纱

一 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的故事

远古时代的历史，是靠祖辈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保留下来的。

有巢氏塑像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今天居住的这片土地，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到处都是茫茫不见边际的森林和茂密的草丛。居住在这里的早期人类，依靠集体的力量与野兽展开殊死搏斗，分食兽肉。同时，也采集一些植物的茎块、果实充饥。白天，他们四处活动；入夜，则栖息在树下草丛中。露宿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忍受夏日的日晒雨淋和冬天的凛冽寒风。此外，还得时时提防着猛兽、毒蛇的侵袭、噬咬，生活是极为艰辛的。有一天，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教会大家在粗大的树干上搭筑起栖身的巢穴，有了这样的固定居所，劳累之余，人们能够得到比较安定的休息，多少减轻了风雨霜雪带来的痛苦，生活的条件明显改善了。人们怀着感激的心情，称他为“有巢氏”。

后来，又出现了一位非凡的人物，从他那里，人们学会了以燧石相击和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取得火种比以前方便多了。大家长久地怀念这位给生活带来温暖的人，称他为“燧人氏”。

神农氏的发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了。据说翻地用的农具耒、耜是他发明的，他还教会了大家种植五谷庄稼，他的儿子则教人们开始种植蔬菜。还传说他曾经尝遍百草，将其中具有治病救人功效的药草告诉了大家，因而他也是医药的发明人。又说他在耕作的同时，教大家制作陶器。他还发明了织布的方法，从此，人们不再用兽皮和树叶来遮身了。

燧人氏塑像神农氏塑像伏羲氏画像相似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几乎人类早期社会出现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与某一位非凡的人物有关。比如教会大家驯养牲畜的叫伏羲氏，他还是结网捕鱼的发明者。甚至还传说他夜间仰望天空，俯察地面后，悟到了自然奥秘所在，画出了八卦图像，发明了文字，还教人们在绳子上打不同的结扣来记录日常发生的事情。

显而易见，这些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在几千年以来的流传过程中，已经被赋予浓厚的神话色彩。这是我们人类在童年时期具有的共同心理特征。今天，当我们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些神话传说一一加以辨析，便不难拂去笼罩在这些古老传说表面的神秘雾纱，辨认出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痕迹，并演绎出蕴含在这些神话传说背后的真正含义来。

有巢氏的传说，为我们描绘了远古时代的早期人类，如何从模仿动物的巢穴，学会构筑洞穴，改善居住条件的漫长过程。在草木蔽天的原始森林里，在野兽出没的广阔原野上，先民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也许先从鸟类的居巢受到了启发，在粗大的树干上筑巢栖居。他们也学会利用现成的山洞岩穴，躲避风雨，栖身休息。渐渐地，早期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还尝试用树干和其他材料，构筑自己的穴居，起初是半地穴式的圆形或方形小屋，后来渐渐发展为地面式建筑，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成为后世房屋、宫室最原初的形态。

燧人氏的故事，表明早期人类如何从不知熟食的茹毛饮血的时代，进入到学会人工取火的过程。原始人类最初是生吃猎物和果实根茎的，后来，经过长期的反复观察，他们学会了利用偶然机会得到自然火，如雷电或火山爆发引起的森林大火。他们渐渐发现，火不仅可以取暖和驱赶野兽，还可以用来加工食物，而且，烤熟的兽肉吃起来更为可口。于是，从利用到学会保存自然火，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人们在实践中又发现了用燧石撞击或钻木取火的方法。火的广泛使用，尤其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标志着人类在生产技术上经历了巨大的飞跃，人们获取食物的范围比以前更加广泛了，防御能力增强了，体质有了明显的发展，脑容量也增加了。火的使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早期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革命性的成就。

从神农氏和伏羲氏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社会后期，农业和畜牧业如何发展起来的痕迹。随着人口的增加，氏族社会的发展，人们由四处迁徙的生活方式逐渐变为定居生活的形式，单纯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经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了。而采集活动中人们渐渐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实的规律，相对定居的生活使人们栽培这些植物变为可能。于是，在长期居住的洞穴附近，人们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产生了最早的原始农业。随着农业的发展，某些被猎获的野兽被驯养成家畜，数量也普遍增多起来，畜牧业得到了发展。粮食是需要使用一定的炊煮器加工后食用的，当粮食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食后，陶器随着人们的需要便产生了。人们还用麻类纤维织布缝衣，告别了用兽皮遮身的时代。随着对植物认识的加深，人们也开始取得了一些草药治病知识。神农氏带给人们的一切，正是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形成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图景。

这便是关于远古时代历史传说所蕴含的真实意义。

二 星罗棋布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被发掘出来。这些深藏在地下的远古文化遗址一旦重见天日，便以无声的语言，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讲述起关于远古社会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来。

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大约在二百万年前，古猿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发展，演变成了会制造工具的人。人类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用天然的石头制成的，这种使用石头工具的时代便是石器时代。根据人类在制造生产工具方法上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我们把以打击方法制成石头工具的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将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工具的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形成而出现磨制石器的阶段称为新石器时代。整个石器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原始社会时期。

远古社会的人类经济活动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采集与狩猎经济开始形成，距今大约有数十万年的历史。

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四百处，北抵辽宁营口、喀左，西至陕西蓝田、大荔以及宁夏灵武，南及云南元谋、广东曲江，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展示了约一百万年以来农业发生之前，生活在中国大陆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旧石器时代人类生产工具的共同特征是，石片石器占主要成分，其次是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制作石器工具的主要方法是以石锤直接打击，从工具的用途来看，刮削器和尖状器最为普遍。随着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刮削器和尖状器的形制渐渐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狩猎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制造石器的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出现间接打制方法，最终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并发明了刮削和磨制骨质工具的技术。此外，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始终是旧石器时代人们围捕野兽所用的重要工具。

距离今天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氏族组织已经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南地区，早期人类的原始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各地的文化遗址来看，人们很可能从使用自然火渐渐发展到人工取火，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距今大约二万五千年。高约四米的洞内，中间有一堆篝火燃烧留下的灰烬。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用火将野兽驱赶到预定的地点以便捕获，用火的威力夺取野兽占据的山洞作为自己栖身之所，还经常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塑像用火来烧烤木棒、竹竿以便制成武器、工具，火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远古时期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效率。此外，人们用火来烧烤食物、取暖、照明和防御野兽的侵袭，改善了体质，脑容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人类彻底摆脱了黑暗。日常生活中火的频繁使用，也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火的利用，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只有在自然火被广泛利用并加以保存时，鱼蚌类和小动物才成为人们经常

性的食物，狩猎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出现人工取火之后，尽管狩猎经济仍附属于早期的采集经济，却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早期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

从工具的发展来显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另一个标志是弓箭的发明，这在主要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如山西朔县的峙峪、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河北阳原的虎头梁等地发现的石器和遗迹中得到了证明。这也是推动狩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距今约四万年的山西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里，动物的骨骼数量以吨计，却不见完整的个体，连完整的头骨都未被发现，这证明基本上都是被早期人类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由此亦可见狩猎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远古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通常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石器工具的制造，通常也是就地取材，在近旁的河滩或山岩上拾取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然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人们对工具的性能有了比较明确的要求，对各种石料的性能和特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某些比较适合于加工石器的岩石产地，便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此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工具，因而，便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文化遗址，便表现了上述特点，我们今天尚能从遗留的大量半成品或废品石器中，辨认出先民试图制成各种用于剥兽皮、刮兽肉的石器工具的痕迹。相对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通常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遗址山顶洞人的遗物中，人们还发现了长 8—2cm 的骨针，一头是锋利的针尖，另一头是用极尖利的石钻挖成的针孔，骨针磨制非常光滑。此外，还有一些用穿孔的兽牙、海蚌壳、小砾石加工成的装饰品，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手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经历了大约一百万年的缓慢进展，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随着火的广泛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终于在大约距今二万年前后，我国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历时约一万年。

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我国分布非常广泛。典型的如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的山西下川文化及陕西大荔沙苑、内蒙古海拉尔独山、西藏聂拉木、河南许昌灵井、青海贵南拉乙亥、云南元谋大那乌等地发现的遗址约数十处。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遗址的距今年代也各有区别，大体上距今一万余年到八千年左右。如青海贵南拉乙亥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其时黄河流域已经进入了农业经济繁荣阶段，而拉乙亥民族的遗存仍保持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

由于中石器时代文化处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既保留了旧的某些特征，也表现出新的气象，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内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之中。社会经济生活依然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继续使用打制的方法加工石器、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最具有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石制箭镞的制作，有明显的锐边和周边。此外，石制矛头的出现，意味着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发明了投矛等更为先进的猎具和渔具，生产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下川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批细石器说明，复合工具如镶有木制或骨制手柄的刀、锯和长矛也比较普遍地得到使用。工具的改进，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为社会经济出现新的飞跃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

随着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的加强，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从过去的洞穴山林开始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草原、湖沼和河谷间追逐兽群，频繁地迁徙居址，以追求更多的收获。与迁徙生活相应，制造并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泊中遨游的技术和建筑房屋的技术都发明了。人们用骨针将兽皮缝缀起来，制成便于行动又能御风寒的服装。人工饲养的家畜，先是狗的驯化，接下来为羊和猪，也出现在后期石器时代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最后，出现了磨光石器技术，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的雏形。农业一旦出现，便意味着早期人类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最

繁荣的新石器时代。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经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需求，同时，也限制了氏族的迁徙活动。长期的采集经验，很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在实践中学会了使某些植物种子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以补充原先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不足。一些最常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培植，成为人们普遍喜爱的粮食，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粟，南方则出现了水稻。农业的发明，又引起了生产工具的革命，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经过磨制的石刀和石镰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用于谷物去壳的加工工具如石磨、石臼也制作得非常细致，磨制的石铲用于翻土，取代了早期的木棍、木铲。与磨制技术相继产生的还有在石器上切割、钻孔的技术。

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生产的标志。农业的产生，便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农业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也改变了人们日常食物的结构。为了炊煮粮食，陶器的制作便发明了，并很快成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手工业。我们今天依靠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来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发展水平，主要的依据便是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

20 世纪以来发现的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五六千年，即新石器早期偏晚阶段以来，远古社会主要经济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脉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期的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以及晚期的典型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生产非常原始。从黄河流域的诸文化遗存，如磁山遗址来看，虽然农业经济已经占较大比重，但仍然发掘出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是野生品种，属于家畜类的只有狗、猪和鸡三种。这反映由于农产品数量不足，采集、狩猎和捕捞等活动在经济中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许多地区尚未形成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居住营地面积较小，房址少、生产工具简单、陶器制作粗糙等共同特点，表明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低下的。生存环境的不同，经济形态也出现各种不平衡性。如中原和华北地区农业经济显然要比华南地区发达，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精致的磨光石器、种类较多的陶器、密藏的谷物，是洞庭湖地区不可见的。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也是氏族制经济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新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增多，农作物的品种产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制陶工艺更趋成熟。玉石加工、竹木器和骨角器制作、丝麻纺织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土木建筑和造船业也呈现新的局面，并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物品。

仰韶文化遗址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从农业生产种植情况来看，粟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此外，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发现的一个陶罐里，盛满了已经炭化了的白菜或芥菜类菜籽。石器农具制作的技术也表现出明显的进步，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生产效率因而得以提高。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水产比较丰富，捕捞方法除了传统的投叉击刺外，出现了垂钓和网捞。制陶业是仰韶文化中比较发达的手工业经济，制坯仍以手制为主，出现了形式与风格各异的彩陶花纹，红地黑彩、白色为地再加绘黑、棕色皆有。彩陶图案绘制显然已经开始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此外，制革工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石片刮削器是人们制革时使用的主要工具，表面呈颗粒状的陶锉则被用于鞣制皮革。纺织和编织业比较发达，从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制蚕蛹来看，氏族先民不仅掌握了葛麻纺织技术，极有可能积累了利用蚕丝进行纺织生产的经验。骨角器加工除了制作一些狩猎、捕捞用的箭镞、鱼叉以

及骨针外，还有许多雕刻制作的装饰工艺品，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思想观念中萌发的艺术和宗教的意识。

位于宁波、绍兴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则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特点。河姆渡遗址中大面积的稻谷遗存，最厚处超过一米，数量之多，世所罕见。这类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地处河网密布的湖沼地带，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工具有大部分是用骨制成的，如耕地用的骨耜，采用鹿、水牛肩胛骨加工制作。骨制生产工具于河姆渡文化遗址分丰富，成为河姆渡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此外，木器制造业也十分发达，已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建筑木构件中，出现了可以有效防止构件受拉脱榫的燕尾榫和带销钉孔的榫。木器不仅应用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做成碗、盆一类日常生活用品。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木质漆碗还表明，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漆器手工业技术。制陶业则以炭黑陶为特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刻画平行条纹、波浪、圆圈等图案。与陶制支座配套使用的陶釜，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

公元前三千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与仰韶文化时期相比，经济发展十分显著，农业生产在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增加了，手工业技术更加成熟。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有上千处，典型的如陕西庙底沟、豫北的安阳后岗、山东大汶口、湖北京山屈家岭和被称为长江文明先驱的良渚文化等。

从陕西的龙山文化遗存情况来看，农业工具已占全部工具的三分之一，表明农业已经成为人们经济活动中的支柱龙山文化遗址产业。大量各种形制的石刀，说明农作物的收获量有了很大增加。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饮酒器具大量而且普遍存在，证实了人们对当时粮食生产能力增加较快，因而酿酒业得到发展的推断。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和畜牧业也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古代主要家畜、家禽都已具备。猪是人们饲养最多的家畜，是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因而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在许多部落的墓地中，都有以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无论是在黄河流域抑或长江流域，犁耕技术开始出现，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最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业，已经普遍采用快轮制陶技术，标志着传统的制陶工艺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作为龙山文化特征之一的黑陶，薄如蛋壳，光洁、明亮，显示了工匠在原料配制和造型、烧制各个工艺环节上高超的技艺。

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发展相当成熟。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而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玉器为璧、环、琮、璜以及各种形状的佩件、串挂饰品打磨技术和刻制工艺非常精细，有些浮雕上的图案，在一毫米宽的纹道内竟有四五根细线。玉器常以卷云纹为底，刻以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南方地区的墓葬中，玉器常常是主要的随葬品，甚至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广东石峡等氏族墓葬中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器，这反映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不但在氏族内部进行，而且跨越了地域界限，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各个氏族部落都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包括氏族首领也在不断追求从交换中为自己谋得精美的陶器、玉器。交换使人口集中、地点比较固定的某些集市逐渐成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最原始的城市诞生了。

龙山文化的城址陆续在黄河流域不断发现，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等。长江流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辽西地区也有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发现。登封王城岗龙山古城有东西两城，城呈方形，西城的西墙长 948 米，南城的城墙长 976 米，城内面积不足一万平方米。淮南平粮台城市规模较大，城内面积达三万四千平方米。南城墙有城门，门侧有门卫房，路面下埋有向城外排水用的两根陶水管。位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是远古社会极重要的典型遗址，龙山文化也因此定名。近年来，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城子”是由

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三城重叠而成，龙山文化遗址的城市面积约为二十万平方米，城内东西宽四百三十米，南北最长处达五百三十米。可以想见，四千五百年前屹立在齐鲁大地的这座古城堡，气魄是何等雄伟。

早期城市的产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结果，龙山文化时期城市的出现，意味着远古社会的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终于叩响了文明时代的大门。

三 大同与小康

《礼记》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礼记》曾经这样描绘过上古社会：天下为公，大家推举能干、公正的人为部落领袖，人们并没有明确的家庭和私有观念。年纪大的长者和幼小未成年的孩子由大家一起抚养，有劳动力的人尽自己力量为公众做事。财富不属于个人，所以，没有盗贼，也没有为自己利益玩弄计谋的人，连主人出门在外时，家里的门户也不必关闭。这样的社会叫大同。后来，社会风气变了，人们有了明确的家庭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大家都尽力使自己家庭变得更富有。原来的部落首领变成世袭制，不再是大家推举公平、能干的人来担任。建起了城池，制定了君臣、上下、礼仪制度，划分了各自的田地。这样的社会叫小康。

《礼记》虽然是后人对上古社会的追述，对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描写，却基本上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真实情况。从大同到小康的社会发展，正是原始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

原始人群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那时候，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能力比较低下。从中石器时代开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了发展时期，促使这种形态发展的，则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首先，妇女是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的主要发明者，她们的劳动成果为人类提供了较采集和渔猎更为丰富的衣食之源。此外，妇女还承担着烹煮食物、生育子女等重要的事务，男子通常还停留在渔猎的生产领域，并没有突出的作为。妇女于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到中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表现出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待遇较高的典型特征，即妇女的随葬品明显多于男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逐渐进入了由妇女承担的传统劳动领域。如农业的发展，犁耕的出现，增加了劳动强度，使男子在生产中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畜牧业也是如此。在手工业方面，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制陶业采用了新的技术，特别是采用快速陶轮，烧制陶器的窑室也得到进一步改进，容量大，劳动强度高，妇女于是逐渐退出了从事制陶业的劳动。

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男子成了经济生产的中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子女世系按女方计算，男子无子女可言。当男女在生产中所处地位变化后，渐渐出现了按男性世系将财产传给自己亲生儿子，动摇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了家庭和私有观念的出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动所获的产品，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求外，还略有剩余。当家庭形成后，剩余产品便成了家庭的私有财产。于是，在父系氏族社会里，出现了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某些墓葬的葬品多寡极为悬殊，大汶口墓群的随葬品中，有的不仅使用木质葬具，还有大量的陶器、骨器、玉器、象牙，个别墓葬中随葬猪头多达十四个，显示了墓主生前拥有财产十分丰富。

第二章 青铜时代

一 若明若暗的夏代经济

夏代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早的一个朝代。关于夏代的文字记载非常有限，又多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史学界甚至有人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夏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大批夏代纪年内的文化遗存，较有力地证实了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之后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这些文化的遗迹和遗物，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夏代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龙山文化末期禹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的故事，反映人们对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视。到了夏代，曾经统一部署了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农田得到有效的利用。由于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猪、狗、羊等家畜饲养较以前有了增加。从墓葬中常见觚、爵等酒器随葬的现象推断，当时的饮酒之风也比较普遍了。

夏代农业生产中开始大量使用奴隶的劳动，日益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对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进行改造，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

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人们对植物的生长和一年四季气温变化周期之间的某种联系有了较深的认识，夏人积数千年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制定了《夏时》和《夏小正》等历法。《夏小正》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和重大政事，其中谈到了有关农业耕种、修补农具、采桑、养马等具体的工作，是最早记录我国农业经济的珍贵文献，并有力地促进了后世农业生产的发展。

手工业中青铜器的出现，证明夏代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坩埚和铜渣来看，铜爵胎壁较薄，表面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兵器是用单范铸成，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青铜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陶器制造业仍然是夏代最主要的手工业。陶器的种类中，有作炊具的鼎、鬲、折沿深腹罐等，作食器、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钵等，还有一些酒器，如盃、觚、爵等。此外，在二里头文化遗址还发现，有一些专门将石灰石烧制成石灰的窑址，附近还有存储石灰的窑穴。看来石灰在当时的建筑业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玉石器制造业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墓葬中出土的玉制琮、圭、璋和其他装饰品雕琢精细，兽面纹或花瓣纹线条流畅，显示出娴熟的技法。有一面兽面铜牌，上面由二百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木制器具的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如食器、兵器和工具的柄杆，还有木仓形器、木匣、木案等家具。木器的表面还常常绘有彩色图案，十分精美。

从夏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来看，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去，同时，又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木工、彩绘髹漆、青铜器冶铸等新的手工业门类。生产的多样化、专业化，也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起来，从而刺激着商品交换的发生。

与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发展的同时，北方和南方地区的氏族部落也在自己不同的区域里发展生产，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如内蒙古地区的夏家店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较原来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和制陶业出现较大的变化，而且，都或先或后地发明了青铜器铸造技术。

夏代经济的发展，使物资交流的范围和种类都较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扩大，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城市雏形发展成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古代城市。奴隶主贵族为了生活上的安逸，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统治上的威严，纷纷在城里为自己修起了宫殿。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凿井技术就在许多部落居住地得以发明和推广。汲水的公共场所，往往也是氏族成员喜欢集聚议事的地方，最早的货物交易很可能便发生在井旁，因而，古人把市井二字连组成词，表示商品交易的场所。从记述夏代史事的文献来看，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

夏代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商品交换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据《尚书·禹贡》所述，天下共有八州向夏王朝入贡各自的土特产，这八州的地域北抵辽南、胶东半岛的青州，南至湖南、湖北的荆州，西达陕甘南部的梁州、关中地区的雍州，东达苏皖南部和长江下游两岸的扬州。这些地区的主要物产包括蚕丝、大麻、象牙、皮革、羽毛、织锦、丝绸、珠玉、漆等，异常丰富。《禹贡》是战国时人所撰，也许不足为信，但参照考古发现成果来看，其中许多内容还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因此，从中我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地方如何向中央王朝纳贡及各地物产的大概情况。

虽然夏代的商品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仍能看到以物易物这一氏族社会的主要交换形式的影响。当然，这时候各部落间的物物交换，已经受到部落首领等贵族们的利用，成为他们积聚私有财产的手段。有些贵族还亲自参加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如商族人的先祖王亥，便曾经驾着牛车，载着帛，赶着牛群，到远方的部落进行交易活动。专门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自由职业者商人还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处在奴隶社会早期的夏代，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成熟，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尚未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这也正是夏代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之一。

二 上古经济的鼎盛时代——商

公元前16世纪，原先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东方部落商族，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发展努力之后，一举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了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

商朝是中国上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尤其是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成为商代文明的突出象征。

农业是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商代的土地归商王所有。一部分作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集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田庄的收获归王室享用。另一部分土地则由商王按等级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为封邑，其收获供臣下享用。农业生产中采用井田制，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洫灌溉系统将田地划分为方块田，既便于管理在田间劳作的奴隶，也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抛荒休耕的管理。

商朝的疆域十分广袤，商王在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土地和山川林泽，一些邦国的土地也并非商王所授，因此，在许多地方，商王只起到象征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对奴隶主来说，奴隶与牲畜和其他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杀死也并不算犯罪。虽然奴隶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统治集团对奴隶并不重视，商朝贵族举行葬礼时，实行野蛮的人殉制度，被杀的奴隶甚至多达数百。

由于改进了石制或骨制的农业工具，使得生产效率有所增加。在长期实践中，人们总结出轮流耕种的方法，从此，耕耜农业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新阶段，不再因为抛荒休耕土地而像过去那样常常迁徙。

从考古发现以及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来看，商代的粮食种类除了粟外，还有黍、稷、麦、稻等品种，瓜果、蔬菜类和桑麻的种植也比较多。

许多商代遗址都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酒器，其品种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可见饮酒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间盛行的享受方式。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酿酒作坊，屋内堆积有大量的灰烬和陶制容器，还有许多桃、李、枣等酿酒原料的种仁及8—5公斤重的人工培植的酵母。酒的大量酿制，反映了奴隶主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然而从侧面也可看到，粮食产量的增加，才有可能大量地酿酒。

庄园是商代农业经济的基础结构，通常在数万平方米面积的庄园里，有若干座房屋，以及储存谷物的窖穴，庄园的遗存物中，还包括各类农具和狩猎用具。

畜牧业随着农业发展也愈益繁盛，各地发现的商代墓葬中，还常见羊、猪、狗做祭祀时的牺牲。商代的黄河流域，人们已经学会驾御牛马，在贵族的墓葬旁，还常有规模较大的车马坑。

商代虽然有较发达的青铜铸造业，由于铜的原料有限，很少见到青铜农具，农业用具的原料基本还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和骨制的水平上。相对而言，南方即长江流域的青铜农具使用比较普遍，因而植稻农业技术发展比较快。

商代手工业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

铸造青铜器需要的主要原料是铜矿石和锡矿石，这两类物资出产在南方，通过水陆交通工具的长途运输，运抵商都和各地贵族的青铜作坊。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商代的交通运输事业也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司母戊大方鼎 在王都和各地贵族统治的大邑中，青铜作坊的规模大小不一，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十余万平方米的，然而都拥有一批工艺水平纯熟、分工严密的工匠。殷墟出土的著名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 137 厘米，重 875 公斤，如果按每个坩埚熔铜 127 公斤计算，铸司母戊鼎需要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按照每个坩埚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工作需要三四人操作来计，铸造司母戊鼎时，至少需要三百人同时操作。这样的生产场面，反映了商代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在长期的实践中，商代的工匠掌握了根据铸铜的需要，调节铜锡比例的方法，《周礼·考工记》中记有世界上最早的铸器调剂表。根据人们今天对商代的钟、鼎等青铜器物的化学分析，与书中所说“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比例基本吻合，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

显示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的还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以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在地方贵族铸造的青铜器中也不乏精品，如陕西汉中发现的商代铜器窖藏中，青铜尊的肩部饰有牛头装饰，最高的达 44 厘米。一件牛头形的兽面具，也是其他地区未曾发现，极富特色。这些作品，包括上述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显示了我国古代工匠杰出的创造智慧和高超技艺，也被世人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

商代的青铜器制造业除了上面介绍的礼器和兵器外，也制作了一些铜镜、酒器和装饰品，供贵族和平民日常生活使用。从出土的遗物来看，青铜还被用来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用的小型工具，以及斧、铤、凿、刀、锯、锥等手工工具。青铜工具替代了原来的石制、骨制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我们习惯上将青铜器铸造的出现，看作是石器时代结束、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标志，正是着眼于其新的生产工具的象征意义。处于奴隶制经济繁荣阶段的商代，以它瑰丽、雄浑的青铜器，向后人显示了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风貌。

陶器是人们日常使用最多的东西。除了日常用的器皿外，出现了建筑用陶，主要是排水管，有的长达 42 厘米。晚期的排水管中，还出现了三通管。

日常用的陶器大部分是实用性的，如炊器鬲、甗、鼎、釜；食器簋、豆、孟、钵；酒器盃、觚、爵、尊、壶；盛储器有罐、盆、瓮、缸等。还有少数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纺轮、网坠、弹丸之类。非实用性的陶器包括墓葬中的冥器。

值得一提的是，从商朝中期开始，南方除了硬陶外，出现了表面涂上一层石灰釉的釉陶，这种釉陶是青瓷的前身，因此，也被称为原始瓷器。釉陶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制陶业的一个转折点。

陶器制造业在商朝很发达，分布也非常广，不同的质料和不同的加工技术，各地的陶器纷纷呈现出自己的风格特色。灰陶器比较普遍，也生产了一些红陶、黑陶和白陶。从纹饰来看，有蕉叶纹、云雷纹等，南方则流行几何形图案。由于各地陶器制作水平不一，有些质量

较高而受人们普遍欢迎的陶器便成为交换的重要货物。因此，从商代遗留的作坊遗址情况来看，既有一些为贵族专用的小型制陶作坊，也有大批量生产盆、甑之类单一品种的大型作坊。

此外，商朝主要的手工业还包括纺织业、制骨业和玉器加工业等。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桑、丝、帛这类字，一些随葬的青铜器上也粘有纺织品的痕迹和麻布的残片。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丝织品印痕带有朱砂染涂制品和机织罗纹，显然这是一种高级织品，由此也可见商代纺织技术水平之一斑。而骨器的制作，由于金属工具尚不多见，仍是一种古老而又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常用工具如骨锥、蚌刀、蚌镰等农具外，商朝墓葬中出土的骨器还显示了令人称绝的工艺水平，如象牙杯通体刻有精细的图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与骨器制作相仿，玉器的加工工艺水平也较夏朝有了明显的进步，如栩栩如生的玉雕动物，各种玉器表面的浮雕图案，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手工业中制陶、纺织、竹木器、玉器加工等行业的专业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许多手工业产品逐渐商品化，奠定了商业产生的基础。到了商朝，不但交换物资的种类和范围扩大了，交换地区也显著增加了，组织产品交换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商业正式出现了。交通运输与商业同步发展，顺着商王朝开辟的驿路，由奴隶主贵族操纵或委托的中介人以及手下的小臣，驱使着大批奴隶，往来于内地和海滨、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贩运着各地的土特产。也有一些平民，将自己捕获的鱼或编织的草席、草鞋之类拿到市上叫卖。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仅占当时商品交易的极小部分，主要的交换活动是在奴隶主之间进行的。而且，交换主要是为满足奴隶主贵族的消费需要，如西方的玉石、东方的珠贝、南方的铜锡矿石、北方的筋角等。

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贝”和“朋”字，贝指海贝，朋则是贝的计算单位，一朋五贝。商朝人非常重视贝，故又称为货宝，是被用于赏赐的东西，也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此外，甲骨文中如买、贮、贷等字，都从贝字。这些现象说明，贝已经具备货币的功能，开始脱离了装饰的功用，成为市场流通的手段。然而由于贝的数量有限，流通上受到很大限制，商代晚期虽然也出现了铜贝，即金属货币。总的来讲，货币制度还处在商品经济萌芽状态的初级阶段，并不稳定。

城市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城市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商朝统治的广阔区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我国历史上的早期城市，如商、殷、亳（bó）、蕃等。这些城市既是商王或各属国的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又是各种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交换各种商品的场所。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情况来看，自从掌握了轮流休耕的农业生产方法之后，城市便比较稳定地固定下来，因而也随之繁荣起来了。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商朝的城市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商朝早期或中晚期的城市，都是用夯打的方法来筑城墙，墙体厚达十余米。城中还建有贵族居住的宫城，宫城内有正殿、附殿、庭院、廊庑，也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城外，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壕。城内特别是宫城里有许多工程浩大的排水系统，包括石木结构的或完全用石块垒砌起来的暗沟。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至商纣王统治时期的王都所在地。经过几代人的建设经营，城市里殷商建筑鳞次栉比，规模也最大。除了规模宏大的王宫遗址外，还有许多中小奴隶主及平民的居住遗址，有大面积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城里还有水井、道路、排水管等遗迹，总面积在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有一些大型商王陵墓，从随葬的大量精美艺术品来看，显示了青铜时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而成百上千的奴隶殉杀坑，则又使人们看到，奴隶制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是多么低下。

从商朝各地发现的城市遗址来看，尽管相距数千里，不同地域的城市，在建筑布局、城市基本设施等方面却显示出较大的趋同性，这表明了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形成。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城市经济在补充和协调农业、手工

业和畜牧业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因此，城市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三 由盛至衰的西周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商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暴虐统治和他那追求享乐的荒淫生活方式，激化了本来就尖锐的社会矛盾，来自西北地区的周族，在周武王的带领下，战胜了商朝的军队，取代了纣王的统治，建立起当时世界东方最强盛的奴隶制王国——周。

史称武王灭商到幽王统治崩溃的三百年左右时间为西周（约前 1066—前 771）。在此期间，社会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各种经济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奴隶制经济进入了全盛时期。

周朝建国，以分封诸侯的形式，加强对广大被统治区域的控制，从而结束了商朝统治时期邦国林立的局面。又制定了一套完整、严格的礼仪制度，用宗法关系将各个诸侯控制在周天子之下。

周天子是名义上全国土地的所有者，诸侯和功臣得到天子的赐田，世代享有，却并没有土地权。周天子可以将赐田收回或转赐他人，所以，我们把西周的土制称为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土地不属于私有，土地买卖的现象就不存在了。

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的主要内容。西周承袭了商朝的土地国有制并有所发展，有了较准确的田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道路系统，因而是井田制的完备形态，大致上是以百步为亩，百亩称为一田。

周天子在进行分封诸侯和赏赐百官时，首先要确定封国疆界，并计算出封地内的山林川泽、耕地面积。天子所赐之田称为采邑。事实上，由于周朝疆域广袤，土地国有制只是一个名义而已，分给诸侯百官的土地，都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王室只是收取一定数量的贡赋而已。真正属于周王的土地，仅在京畿周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和贵族们越来越公开地将土地据为己有，到了西周晚期，土地交换和买卖成为很平常的事，在一些青铜器的铭文中，不但记载了双方交换的内容，甚至还列出在场作证的王室官员名字，以作凭据，可见土地私有制已成为西周后期一个既成的事实。

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买卖的出现，是西周社会经济形态中一个非常显著的新现象。

与商代相比，西周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从工具来看，青铜制农具的应用略有增加，主要还是以木耒、石耜、骨铲、蚌刀这类工具进行劳动。但在修筑排水灌溉等设施方面，人们积累起较多的经验，并掌握了除草、壅土、施肥、治虫等农业生产技术。收获后粮食的加工和贮藏方法也有了新的进步，并推广了用自然冰贮藏食品的技术。

西周农作物的品种很多，重要的谷物有粟、黍、稷、糜、芑、粱、菽、麦、稻等，有百谷之称。桑麻的种植也非常普遍，豆类和瓜果、蔬菜之类则多种植在用栅栏围起来的园地中。秦汉以后中国大陆的主要农作物，西周时期都已齐备了。

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加工技术也有了提高。酿酒技术较过去进步了，还学会了制造饴糖和煮桃、煮梅、用盐渍菜和制作各种调味的办法。

从“耦耕”技术在西周时期广泛实行的情况来看，使用人群密集型的劳动仍是主要的耕种形式，担任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是奴隶，他们生活在邑、社等农村基层组织中，社会地位很低下。西周中期开始，私人土地和自由民数量有了较大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也逐渐加快了。

在西周的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和青铜器、玉器等制造业的成就比较明显。以制陶业为例，硬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继续得到发展，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陶器的种类和形制是沿承商代传统发展的，主要在形制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其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用陶的种类除了水管外，出现了板瓦、筒瓦、瓦当。位于陕西岐山的一处西周时期窑址遗物中，有一批空心砖、条形砖等建筑材料，这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未得到普

遍推广，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制砖技术。原始瓷器的数量也较过去增加了许多，并从其生产地南方流入黄河流域广大地区。

青铜器的生产，体现着奴隶社会时期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从现存青铜器的数量来看，西周时期远远超过了商朝，种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兵器中的剑、戟是过去所没有的。器物的花纹也从商代的繁缛而趋于简明的风格，器壁也从厚重趋于轻巧，具有更加朴素和实《诗经》用的特点。西周的许多铜器都铸有铭文，内容为记载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料，如涉及土地交换情况的散氏盘、卫盂等。铭文最多的如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字字珠玑，如同镶在夜空的群星，精光四射，是早期书法艺术作品中的精品，由此可见当时铸造工艺之精巧。

从《诗经》保存的歌谣来看，三千年前，采桑、养蚕和缫丝、织锦业就已是妇女日常从事的劳动内容了。与商代相似，纺织业的遗迹和遗物很多，从一些丝织物遗留的痕迹来看，刺绣工艺已经发明。而在骨器制作工艺方面，牙雕艺术非常精湛，如象牙杯、象牙杖首等，雕成虎头状，五官刻成细槽，再镶以绿松石片。刻花骨器上的各种花纹非常细致、美丽，有很高的观赏收藏价值，常被贵族作为随葬的物品。在手工业技术方面，漆器的加工发展也开始比较成熟，如西安井叔墓出土的漆案，黑色漆底上，绘有精美红色的图案，整个铜蹄足案制作精致，造型美观。在北京房山出土的燕国贵族墓葬里，彩色漆盾，嵌有铜钉，与长矛成组随葬，反映这两种武器已经被配合使用了。生漆并且还是市场上交换的物品之一，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髹漆工艺有着非常悠远的历史。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西周的商业活动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在奴隶制经济中，作为种族奴隶的商贾，与制陶业、铸铜业等手工作坊里的奴隶一样，都隶属于官府，供王室或各封国奴隶主贵族役使，称为工商奴隶。因此，商业活动主要由官府操纵，商品的交换也只能在官府允许的范围里进行。一般平民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能出售一些剩余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也有些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由农民转为小商贩，或替奴隶主贩运一些土特产品，他们的身份当然要高于商业奴隶。西周后期，一些新出现的小贵族也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商人的社会力量。

在西周的城市中，市场的设立和管理都由政府直接规定，一天只进行三次交易，朝市以各地大商贾之间的交易为主，日中市以一般消费者为主，夕市以小商小贩经营的剩余农产品或手工制品为主。入市的货物须按照规定整齐码放在指定的地段。据古书记载，西周时期甚至还规定了未到收获期的五谷、未成熟的水果、未到砍伐期的树木、未到捕杀阶段的禽兽鱼龟皆不准上市，可谓开创了我国市场管理制度的先河。

由于许多商品的交易是经过长途贩运，跨越地域界限来进行的，因而商业制度中，还包括对商税的征收制度，设有专职的司门掌管城门的开闭，司关则对出入关货物进行检查。总的来说，西周官府对行商的长途贩运活动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并没有后世轻视商业的做法。而中原地区和沿海各地频繁的贸易往来，则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货币在交换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开始在西周统治区域里广泛地流通，并成为财富的象征。一部分统治集团的人物加入了市场经营和贸易活动，使商人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西周晚期，土地交换和买卖现象频频出现。这一切，都是西周社会经济活动繁荣发展的表象下出现的，然而，正是这些现象的出现，最终发展成处于全盛时期的西周奴隶制经济的否定因素，预示着青铜时代开始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

一 铁犁与钢剑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将国都从丰镐(今陕西长安西北)迁到了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被史书称为东周的历史。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为止，长达五百多年的东周又被分为前期的春秋和后期的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显著的标志之一，便是铁器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因而，人们又形象地将这段历史称为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的开始。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春秋中期即公元前 7 至 6 世纪，我国便掌握了铸铁技术。公元前 513 年，晋国将刑法条文铸在铁鼎上，说明铸造铁器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20 世纪 70 年代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晚期铸造的铁鼎，不但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史事，还反映了铸铁技术在长江流域也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我国古代具备铸铁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掌握了冶铁鼓风的技术。以皮囊制成的鼓风设备，提高了冶铁炉的温度，也增大了炉内的容量。与欧洲人迟至 13 至 14 世纪才使用铸铁的情况相比，我们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了大约一千九百年。

春秋时期，冶铁技术的另一个进步便是出现了钢。关于吴国制剑名匠干将与妻子莫邪铸剑的故事流传很久，它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末年人们铸造铁器的情况，据说铸剑时共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来鼓风装炭，规模是非常可观的。从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钢剑来看，经历了二千多年，剑锋依然寒气逼人，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并非虚构的神话。这个时期的钢是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使铸铁内部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而成的，这正是“百炼成钢”成语的由来。到了战国后期，不但兵器中较普遍使用钢制品，铁凿等工具也开始用加热锻打的钢制成的了。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成为农业、手工业中的主要生产工具。铁矿的开采在我国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冶铁和铁器出土的遗址遍布全国二十余省、二百余处地点，不仅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辽宁、吉林、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许多铁器出土。从种类来看，出土的农具有镰、锄、铲、耙、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铤、刀、杖、锤、凿、钻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刀、匕首、镞、弩机、胄等；其余如鼎、釜等生活用具和颈锁、脚镣、车具、钉子，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铁器的大量铸造，还发明了用铁范浇铸的技术。铁范能够连续多次浇铸使用，而且铸件的质量比较稳定，也不必再作太多的加工，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来说，都是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促进了铁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

战国铁器 铁器的应用，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明显的改观。传统的木石农具如耒耜，改成铁制之后，变得更为轻便。铁制的新式农具还有用于除草的铧(yáo)、耨(nòu)，掘土的工具如镢、锹，以及平整土地用的铁耙。铁斧便于人们砍伐林木，是用来开垦荒地的主要用具，而铁犁铧的发明，使耕种方法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在传统的耦耕方式之外，出现了用牛或马等畜力进行犁耕，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二至三倍。春秋战国时期，犁耕现象的出现并逐渐普及，在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农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传统的耕作制度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休耕制仍是主要的耕作制度，到了战国，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加上灌溉、施肥条件的改善，在同一块田地上，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制大面积扩展开来，先由中原地带耕地肥沃的魏国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耕作制度。更引人注目的是，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种植五谷的地区，如果种植小麦，越冬后夏初即可收割，此后，再播一茬大秋作物，便可能成为一年两收了。